巫术与诗歌

用科学观点来衡量巫术，人们必须称之为“胶固着一般人心最厉害的一种迷信”，但是，假如把巫术还原为原始的形态，并放到它赖以产生的原始社会前期来评价其作用，人们将不能不承认：这个‘黑艺术’(巫术)虽然作恶不小,它也曾是好多善事的源泉；虽然它是错误的孩子，它也曾是真理和自由的母亲”。而且“在另一方面也为科学准备了道路”。[①] 不仅如此，在重新探讨诗歌起源的时候，人们还会发现：巫术活动是人类最早的社会实践之一，作为巫术重要组成部份的咒语，是最早的诗歌。

一、还巫术以巫术时代的价值

世界著名人类学家弗雷泽在他研究巫术的伟著《金枝》中，用比较充分的材料论证了一个观点：万物有灵论不是原始文化的唯一信仰，原始宗教也不是最早的信仰，在它形成之前，还有一个重要阶段，即巫术阶段。

巫术是原始初民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为实现自己愿望而形成的信仰。它的主要特点是企图用人力控制自然，以满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足求食及其他方面的需要，而其控制方法乃是直接去办，即用符咒仪式迫使自然力和自然物服从自己的意志。原始巫术与宗教的区别，在于原始巫术没有神灵观念，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愿望，而宗教则是建筑在万物有灵论的认识基础之上，通过对神灵的祈求，依靠神灵的力量实现愿望。

弗雷泽的观点得到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和社会学家的广泛支持，世界著名的功能学派社会学家马林诺斯基就支持他的观点。调查原始民族得来的材料也有力地证实了他的观点。现存的原始民族普遍存在着巫术和原始宗教，从实际情况看出，巫术先于原始宗教的看法比较符合客观实际。

食物的获得和人类自身的繁衍，是处于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初期人们最基本的活动，获取食物的最早方式是狩猎和采集，而狩猎和采集的生产成果不象农耕经济那样稳定，尤其是狩猎，它经常处于大幅度的变动之中，狩猎者还时时存在被野兽伤害的危险。人类自身的繁衍，对于原始初民则存在一系列难以捉摸的因素，如妇女的受孕，孕期的病变，分娩时的难产，畸形婴儿的降临，产妇奶水的变化，婴儿的多病和死亡等等，在初民眼里，这一切都充满神秘力量的作用。这个时期，人的思维极其简单，认识离不开感觉动作，离不开物相变化，他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都以直观和直感为基础，因而对于狩猎采集情况的变化无常，生育过程中种种意外现象的出现，以及自然界的各种变化，都不可能得出接近客观规律的认识，而求食和增殖的欲求又迫使他们必须探索出获取食物和保障增殖的可靠方法，这就形成认识能力和欲求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就成为培育巫术观念的温床。矛盾越是尖锐，巫术越是容易形成。

在宗教产生之前，前人求食和增殖的做法已成为顽强的传统力量，对后人具有强大的支配作用。后人对于“经验”的错误总结，又同时支持和增强了传统力量。这样相沿成习，并以错误的类比联想继续发展，就成为巫术。

巫术的作用，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不同的作用。

原始巫术，来自求食和增殖的善良愿望。尽管采用的是错误方法，但在当时，这种虚幻的信念却可以产生强大的精神支撑作用，只要想象一下原始初民与自然斗争的情况，就可以理解这种精神力量的价值。在那“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虫蛇”（《韩非·五蠹》）的洪荒时代，赤身裸体，构木为巢的原始初民，既得与毒蛇猛兽“同域”、“共居”，又要凭藉最简单的木石工具与之“以力相争”，把野兽作为主要食物来源，如果没有可以战胜野兽的信念，人们就很难有勇气去与自然作斗争。巫术，正好能给予人们这样一种信念。这信念，在当时可以转化为物质力量。正如中外历史上不少人出征时要挂上“护身符”，认为有了它就可以抵挡敌人的枪弹和刀箭，“护身符”本身不能抵挡枪弹刀箭，但被它支持着的勇气却有时可以压倒敌人的枪弹刀箭。有些巫术行为也含有一定的正确因素，如陶来斯海峡的岛民用尖身鲸鱼的模型去吸引其同类来受死，就与美国海洋生物学家拉·沃特森研究证实的鲸鱼集体自杀的原因有部份相同。因为巫术与宗教不同，它毕竟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直接去办，用自己的力量去实现愿望。巫术与科学，目的相同，方法不同。科学建筑在归纳、分析、实验的基础上，巫术则受以直观、直感为主要特点的原始思维支配，把实现愿望的方法建

筑在错误的“经验”总结和联想的误用上，但是，巫术行为中符合或接近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部份，同样可以为科学提供认识，巫术的失败，也可以促使人们采取非巫术的方法来实现愿望，这样既促进了宗教的形成，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用今天的巫术与科学联系对照，如同水与火不能相容，但从科学的源头来分析，它却与原始巫术有着不可忽视的联系。

我们这样肯定巫术的历史作用，很可能受到一种责难，认为是在替唯心主义唱赞歌。这就涉及如何历史地看待唯心主义的作用问题。列宁说过：“僧侣主义（＝哲学唯心主义）当然有认识的根源，它不是没有根基的，它无疑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然而却是生长在活生生的、结果实的、真实的、强大的、全能的、客观的、绝对的人类认识这棵活生生的树上的一朵不结果实的花”。② 列宁是在谈人的认识不是沿着直线运行的时候谈这段话的。这段话给我们提供了认识和评价唯心主义的基本观点。唯心主义诚然是一朵不结果实的花，但它并不是凭空产生，它有其认识根源，是人类认识史上的一个必然阶段，在历史上曾经发生过一定的作用。

不可否认，巫术具有非常突出非常明显的消极作用，因为在当时巫术不仅仅是一种观念，而且是行为，是人们欲达到某种目的所必须遵从的箴铭。用一种不符合客观事物发展规律的箴铭来指导实践，就必然产生大量悲剧。我们研究巫术与诗歌的关系，是以原始巫术作对象。原始社会前期的精神产物，必须还之以巫术时代的价值，否则就不可能正确认识原始巫术的历史作用，更不可能认识它与诗歌的关系。

二、语言魔力信仰的产生和发展

要明确巫术与诗歌的关系，必须首先明确语言在巫术中的地位。

在现代人的观念里，语言是思想的象征符号，是运载信息、传达信息、传递文化遗产的工具，但在原始初民观念里则大不一样，他们相信语言具有魔力。语言对于他们，既是工具，又是实现愿望的主要依靠，是支配自然的“上帝”，甚至就是愿望本身。

语言魔力信仰，首先体现于对待名字的观念和做法上。原始初民并不象我们一样把姓名视为无关重要和沿于习俗的表记，他们将姓名看成一种必需而且具有特殊意义的东西，看成是人格的最主要部份。具体说来，就是以“名”定“命”，以“名”消“患”，以“名”寓“权”，以“名”寓“能”，以名字增强氏族感情。

语言魔力信仰的第二个重要表现是认为咒语可以支配自然，控制自然。费尔巴哈在分析巫术与宗教的本质区别时提出一个重要命题：“在巫术中，人的单纯意志就是支配自然的上帝。”他说：“基督教徒推在上帝身上的东西，巫术把它放在自己身上；被基督教徒当作一个和平、柔顺意志的对象，当作一个虔诚的愿望的东西，巫术则把它当作一个坚决意志的对象，当作一个命令的对象，总之，凡是宗教借着上帝、和上帝同做的事，巫术是单凭自己独立地做”。③这是很深刻很精辟的分析。我们必须随之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是：这个单纯意志究竟通过什么来表达？来实现？我们的回答是：主要通过语言，说得更具体一点，是通过咒语。在巫术与宗教观念融合之前形成的咒语就是原始初民的“上帝”。

在名字上寄托愿望和希冀，是以特定的个人为对象，通过他一生的行动来实现。咒语则不同，它是直接以自然为对象，凭藉语言去直接实现愿望。“从天来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这是狩猎咒语，里面没有对神灵的祈求，一切全靠自己去做。

语言魔力信仰的第三个重要表现，是以诅咒作为制服对手的重要武器。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与人的关系日趋复杂，部落之间、氏族之间、个人与个人之间的争斗逐渐增多，咒语的支配对象就逐渐由自然转向社会，通过巫术表达的愿望也就不完全是善良的愿望，其中也含有恶意成分，咒语也因之逐渐变成诅咒。

人际关系的变化必然要在神际关系中找到对应。有了神灵观念之后，诅咒也就伸延到神灵与神灵之间。所以，从原始文学和原始意识的遗存中看到的诅咒，既有人对人的诅咒，也有人对神和神对神的诅咒。苗族《洪水滔天歌》中，哥哥提出：“处处无人烟，我们兄妹来成亲”之后，妹妹发出诅咒：“哥哥说话不是人，不是人来是畜牲。”话音刚落，哥哥即昏迷倒地，死后八天才苏醒。④这是人对人的诅咒，显示了女性诅咒的威力。在《圣经·创世纪》中，狡猾的蛇引诱夏娃吃了耶和华不准吃的那棵知善恶树的果子，耶和华乃对蛇发出诅咒：“你既作了这事，就必受诅咒，比一切的牲畜、野兽更甚，你必须用肚子行走，终生吃土。”所以蛇用

肚子行走，终生吃土。

第四种表现是相信念诵能消除灾厄。布依族孩子患病，经巫师看相，如果认为是被“阴箭”射伤，即在岔路口立一指路碑，认为过往行人口中念念碑上的去处，即可以逐渐磨掉“阴箭”所射的伤疤而使孩子逐渐痊愈。在汉族的公共厕所中，常见这样的字帖：“天黄地绿，小儿夜哭，君子念过，睡到日出。”都是念诵消灾厄的遗留。

第五种表现是相信语言在有血缘关系的人们中具有神奇力量。在彝族叙事诗《阿诗玛》中有这样的情节：阿黑营救被热布巴拉抢走的妹妹阿诗玛，向热布巴拉家射出三支箭，一箭射中大门，一箭射中堂屋的柱子，一箭射中供桌。热布巴拉很恐慌，用五条牛来拖，不见动分毫。阿诗玛来拔箭时，她说道：“哥哥射出的箭，妹妹拔得下，”说完，就象摘下花朵那样把箭轻轻拔掉。

语言，在血缘公社中诞生，在氏族中发展。氏族，是原始社会最基本的社会组织；氏族利益是当时最高的利益；氏族感情是当时最深最强的感情；《阿诗玛》诗中体现的这种特殊观念，正是氏族观念通过语言作出的表象。

语言何以能成为原始人支配自然的“上帝”？这就得从语言的产生及其在原始初民生活生产中的作用谈起。“语言的获得，一定是相当早的，试看人脑承袭下来的结构中受到怎样的影响，就可以看出早到什么程度。占据人脑一半还多的眼手协调复合体系，基本上只是从似猿祖先承袭而来，经过精化的结果。至于相应的耳舌协调复合体系，虽不甚大，却简直是件新创造。只有社会开始后，这个复合体才能植根于人类而逐代遗传下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霍洛韦

（R·L·Holloway）对化石内膜的详细研究，提供了不少出乎意料的证据，他用乳胶制成了头骨化石内膜。他试图从头骨的形状对脑的精细形态作出某些判断。他认为被称作布罗卡氏区（即旁嗅区）的一个脑区是语言所需的中枢之一，这在脑内膜化石里可以检测出来。同样，他也在二百万年前的能人化石中发现了布罗卡氏区的证据。因此认为：语言、工具和文化的发展是齐头并进的。[5]

语言究竟产生于什么时候，无法从考古材料中得到直接论证，但从考古发掘的带有巫术功能的壁画中，却可以得到间接论证材料。在法国南部发现的“拉科斯洞窟壁画”，就可以提供间接论证材料。拉科斯洞洞口狭窄，洞窟深入山岩，都很黑暗，说明原始初民在这里画壁画的目的不是为了娱乐或观赏，而是为了一种严肃的目的，是巫术仪式的需要。壁画中有野牛被标枪刺中的画面，是感致巫术的艺术体现。感致巫术的基本原理是“同能致同”，即类似的行为可以实现类似的结果；占有一个图画对象就意味着他有神秘的权利去占有那个真实的对象。他们相信，既然壁画上出现野牛被标枪刺中倒地的画面，生活中也就必然出现相同的情况。法国南部的原始初民能够通过绘画艺术表现巫术心理，说明在这之前很久很久，巫术活动就已有了比较充分的发展。语言产生于绘画之前，用语言占有对象的观念早于用绘画占有对象的观念。“对原始人来说，占有词也就是占有词所代表的事物。”[6] 拉科斯洞窟壁画的绘制时间，距今将近两万年，由此可知，在这之前许多万年，语言就已产生，因为由语言产生到形成壁画艺术，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在生产力极端低下的原始社会，语言是团结氏族成员，促

进社会发展最强有力的工具。语言本身就是生产手段之一，它甚至在当时所有生产手段中占第一位。一群赤手空拳，或手持杀伤能力极低的未经加工的树枝石块合力追逐野兽，就只有能使用手势或语言，才能统一行动，密切合作，猎获野兽。这种群体行动中的语言有很强的感情色彩，有动人的力量，甚至具有强迫性质。原始初民看到语言能支配人们的行为，便据此作出错误的联想，认为语言具有魔力，语言可以支配自然。语言魔力信仰，就是这样逐步发展而成。

三、原始咒语是最早的诗歌

当我们对语言魔力的信仰作了探索之后，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原始咒语在诗歌中居于什么地位？原始咒语是不是最早的诗歌？

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原始人是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生活，为了什么目的而开始进行诗歌创作。

把原始初民的生活条件美化为人间天堂，似乎当时人们的生活需求可以轻而易举地从自然界得到满足，是不恰当的。列宁就曾经批评过这种观点。他说：“说原始人获得的必需品是自然界无偿的赐物，这是笨拙的童话……这种黄金时代在过去从来没有过。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感到十分沉重的压抑。”[77] 现今世界上最原始的民族之一——澳洲阿兰达人的生活情景，正可以作这段话的有力证明。阿兰达人被发现时只剩下数百人，他们住在木石垒搭成的木棚里，男女都不穿衣服，以木石作工具，用石矛与木盾磨擦取

火，食物来源全靠狩猎和采集，女人用挖掘棒寻找块根和穴居小型有袋乳类动物，男人用石矛抛掷器猎杀袋鼠和鸟类。这就是石器时代原始人的生活图景。澳洲的自然条件不算很坏，其生活条件尚且如此，温带寒带地区原始人的生活条件将是何等艰难，就可想而知。更何况人类历史上经历过几次冰期（新冰期距今三至五万年），冰期来临时，整个世界冰封雪冻，人们只能在山洞里躲避严寒，冰期过后，日暖春回，冰雪溶化，大地上又是一片汪洋，其困难程度，今人实在难以想象。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生活，原始初民怎能不感到“沉重的压抑”？

艰难的生活条件决定了人们意识活动的基本趋向：一切行为，必须服从食物的顺利获得和种族迅速繁衍的需要。被今人称为精神领域的活动，也得服从这种需要。这就是探讨诗歌起源的客观依据，离开这些而从其他方面进行探讨，是不正确的做法。

对于艺术起源，古今中外，有多种主张，各有其理论依据。“摹仿说”的依据是人有摹仿的天性，“人从孩提时候起就有摹仿的本能”。[8] “游戏说”的理论依据是“力量的过剩是一种原动力”，“自然开始于需求的强制或者自然物的游戏，转到审美的游戏”。[9] “摹仿说”的倡导者亚里斯多德和“游戏说”的倡导者康德和席勒都没有直接论述原始人的生活条件，但从他们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并不认为“生存的困难，同自然斗争的困难使原始人感到十分沉重的压抑”。所以，摹仿和游戏，都在一种愉快的力量过剩的情况中进行，没有实用目的，“摹仿的目的是为了获得快感”，游戏的目的是寻求“摆脱一定的外部需求的自由”，“自由

活动本身就是目的和手段”。这些看法，显然不符合原始人的生存条件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意识活动的基本趋向。普列汉诺夫有句名言：“人最初是从功利观点来观察事物和现象，只是后来才站到审美的观点上来看待他们。”他还说，如果我们不把握着这个思想，“那么我们将一点也不懂得原始艺术的历史”。[10] 处于蒙昧时期的原始人，不可能在食不果腹或面临种族灭绝的情况下，离开求食和增殖而以审美的观点去从事艺术活动，那些被今人称之为精神领域的行为，在当时，与狩猎、采集、抵御其他部落侵略的实际行为，都出于同一目的。所以，北美洲的红种人跳自己的野牛舞，是在好久捉不到野牛而他们有饿死危险的时候，他们认为野牛的出现与舞蹈有因果联系，因而舞蹈一直要继续到野牛出现。法国南部的原始人在拉科斯洞阴暗狭窄的岩壁上画被标枪刺中的野牛图象，是为了狩猎时能占有被标枪刺中的野牛。

如果承认上述观点正确，那末，原始咒语在诗歌发展史中的地位问题也就容易得到解决。

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已经明确：巫术的特点是把自然当作一个坚决的意志的对象，当作一个命令的对象，而实现目的的主要手段是用语言去控制自然，支配自然。如果以原始初民的生存条件为基点，结合他们用咒语时的功利目的来分析，那末，原始咒语是不是最早的诗歌这个问题，也就容易得到解决。

原始咒语产生于神话之先，全靠口头保存，比较完整的原始咒语现在很难找到，但从古籍文献及后进民族的一些咒语中，仍可以看出它的基本面貌。

原始初民最关心的是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大自然对于狩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猎民族，不过是一种实际的兴趣而已，因此，涉及自然的咒语，都是满足求食的需要。

神北行，
先除水道，
决通沟渎！
土返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勿作，
草木归其泽。[11]

这是消除旱灾及命令自然服从人的意志的咒语。这里出现的“神”并不是宗教的神，而是一种自然力的代称。也不是对魃祈求，而是对它下驱逐令，并给它交代任务。所以《大荒北经》云：“所欲逐之者，令曰：‘神北行，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雷啊！怒吼吧，请你使大海的波涛汹涌，
雨啊？请你用甜蜜的雨水浇洒大地，
请你在庇护人的身上浇下倾盆大雨，
让那些瘦牛的主人快快回家去。

这是印度古老的咒语集《阿达婆吠陀》第六卷中的咒语。

结合前面提出的“从天来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罹吾网”的咒语，可以看出原始初民是以十分自信的心情用语言去支配自然。

种族之间的战争，给种族的安全和生存带来严重威胁，它对于原始初民的危害仅次于自然灾害，所以狩猎民族的男人既是猎人，又是战士，他们的咒语也就反映了这方面的内容。印度《阿达婆吠陀》第5卷21首祝战鼓发挥威力的咒

语，就表现了人们克敌制胜的愿望：

鼓啊！到敌人中间去说话，
使他们离心离德，
使敌人互相仇恨，发生恐慌，
鼓啊！把他们一齐消灭。
……
象飞鸟见老鹰就发抖，
象狮子昼夜都怒吼，
鼓啊！要使敌人心恐慌，
使他们的心没主张。

在缺乏医药的原始社会，疾病造成的灾难有时不低于敌人造成的灾难，所以他们也用咒语去制服疾病。印度《梨俱吠陀》中有20多首咒语就是为制服毒虫，治疗疾病而创作的。如第10卷第60首说：

风向下吹，
阳光下照，
牛奶向下流，
你的病快下去。

《阿达婆吠陀》第6卷第105首是治咳嗽的咒语：

象心中的愿望，
迅速飞向远方，
咳嗽啊！远远飞去吧，
随着心愿的飞翔。
象太阳的光芒，
迅速飞向远方，
咳嗽啊！远远飞去吧，

跟着大海的波浪。

妖魔鬼怪，实际就是灾难祸害和坏人坏事的代名词，所以向来为人们所憎恶，必欲除之而后快，云南澜沧拉祜族的《咒魔》表现的就是这种感情：

我决不放过妖魔鬼怪，
天地不倒转时，
河水不倒流时，
你休想逃跑。
……
啊！七座大山镇压你，
七条河咆哮淹没你，
关在井底下，压在石头下，
啊！天地决不倒转，
妖魔休想逃走！
啊！河水决不倒流，
妖魔你休想逃走。

这些咒语中，没有自然景色的描绘，没有男女温情的抒发，有的只是解决生活中重要问题的功利目的。用唯美主义的审美标准来衡量，似乎不能称之为诗。但我们必须明白：“大自然对于狩猎民族，不过是一种实际的兴趣而已”；异性的相互吸引，在那个时期主要是出自动物的本能和繁衍种族的需要，还不是经过升华的爱情，因此，只有解决实际问题的努力，才能激起原始初民最大的热情，否则就将与他们格格不入。《虞书》云：“诗言志，歌永言。”朱熹曰：“……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

咏叹之余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12] 这两段话的精髓是“志”和“欲”，即诗乃有所感而作，有所为而发。“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如果我们把原始咒语的内涵作一个总的概括，那就是企图用语言消除艰难的生存条件造成的“沉重压抑”。原始咒语表现的这种愿望，就是原始人最大的“欲”，最高的“志”。它也有韵律，有节奏。所以我认为：原始咒语就是最早的诗歌。

这一看法，显然与传统看法大相径庭。传统看法认为：“诗歌的渊源起于劳动呼声，最初的诗歌是劳动呼声的发展”。这看法有它的理论依据和现实依据，所以能长期居于支配地位，似乎无可非议，笔者过去对此道也深信不疑，只是在近几年对巫术作了探索之后，才觉得有重新评价的必要。

劳动时常伴有呼声，古今皆然。劳动呼声有两种，一种是简单的属于生理需要而自然发出的声音，如“杭育！杭育！”“嘿嗬！嘿嗬！”如今四川码头经常可以听到这种呼声。一种是把劳动呼声作了发展，加进劳动者的意愿，如川江号子，打夯歌一类。如果我们承认诗歌必须表达感情和愿望，那末我们就得承认：仅仅出于生理需要而自然发出的呼声，不是诗歌。狩猎和采集，是原始初民最早的谋生方式，人们靠木棒撬食物，用石块、木棒投击野兽，集体吓唬野兽的吼声可能很早就出现，至于“前呼邪许，后亦应之”的举重劝力之歌，则难于在这个时期出现，加进劳动者感情愿望的劳动伴奏，更是很晚很晚以后的事。在这个时期，人们最关心的是如何捕获野兽，采到果实。《傣族古歌谣》中的

《摘果歌》、《采菌子歌》，描写了远古傣族人民采集到野果野菜时对植物的感激心情，并向植物致谢。对植物感激致谢已经含有宗教观念。在这之前，一定还有命令或希望果菜出现的咒语。因为由获得之前产生希望到获得之后表示感谢，是意识变化的必然过程。从较长的历史时期分析，用愿望支配自然的咒语先于劳动呼声，先于获取食物之后的感谢，是可信的。从原始社会的一个劳动过程来分析，也是如此。

弗理采在他的名著《艺术社会学》第二章内，将艺术的发展分为巫术的、宗教的、教育的、纯粹艺术的四个阶段，很有见地。刘大杰对周易的评价也很值得重视。他说：“《周易》虽是一本迷信的卜筮书，因为当代的艺术，正在巫术的统治时代，所以它在中国的文学史上，是要作为卜辞与《诗经》的过渡时代的重要文献来考察的。”⑮

原始咒语对后世诗歌的发展有很深的影响。后世诗歌的渊源，一条是原始咒语，一条是由劳动呼声发展成的诗歌。前者支配着神圣的领域，后世的祭祠、仪式歌、习俗歌，大都由原始咒语发展而来。后者支配着世俗领域，它由劳动呼声发展为具有劳动者感情愿望的劳动伴奏，并随着生活的丰富和人际关系的复杂，使其内容变得日益丰富。由这两个源头发展而来的诗歌，常常呈现交织融合的现象，仪式歌、习俗歌中有世俗内容，劳动歌曲、战斗歌曲、爱情歌曲中有巫术心理和宗教观念。这种现象，不仅在民间歌谣中大量存在，就是在作家文学中也大量存在。莎士比亚笔下的《李尔王》就有这种成分。当李尔王被他的女儿逼得走投无路，不得不在漆黑的夜晚，在风雨交加的荒野行走时，他发出愤怒的呼号：

你，震撼一切的霹雳啊！把这生殖繁密的饱满的地球击平了吧！打碎造物的模型，不要让一颗忘恩负义的人类的种子留在世上……

郭沫若笔下的屈原在神庙中对暴风雨发出的呼号，与李尔王的呼号也很相似。

关汉卿笔下的窦娥在遭冤屈死之前，悲愤地发出三个誓愿：一、不要半点热血红尘洒，都只在八尺旗枪素练悬；二、六月飞花滚似绵，负得尸骸现；三、三年不见甘霖降，使恶官污吏遭天谴。

这里有对贪官污吏“无心正法”的愤怒斥责，也有巫术心理的迸发。两者融合之后，才可能发出这样三条誓愿。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实现的誓愿，但在“皇天也肯从人愿”的巫术观念支配下，却在艺术中得到实现。

马林诺斯基说得好：“凡是希望与恐惧之间的情感作用范围很广的地方，我们就看得到巫术”。⑭但从前面引的两个例子中，我还想补充一句，凡是悲愤之情达到极顶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巫术。

巫术观念对人们的影响太深了，即使在革命者的诗歌中，在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抱有充分信心，并无恐惧和悲愤的情况下，也会流露出巫术心理。苏联红军歌曲中有这样一段：

再见吧！亲爱的故乡，
胜利的星会照耀着我们。
再见吧！妈妈！
别难过，莫悲伤，
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